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

3 金銀器 (三)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

3

金銀器 (三)

K876.432
1
3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

3 金銀器 (三)

中國金銀玻璃琺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主編 楊伯達

出版發行者 河北美術出版社

(石家莊市和平西路新文里八號 郵編 050071)

責任編輯 張建斌 賀寶銀 苑誠心 冀少峰 王豐 徐濱

製版者 北京燕泰彩視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310-1727-X/J.1419

國內版定價 叁佰玖拾捌圓

版權所有

凡例

- 一 《中國金銀玻璃珐琅器全集》係《中國美術分類全集》之組成部分。該全集分爲金銀器三卷、玻璃器一卷、珐琅器二卷共六冊。
- 二 選錄之器物均爲各時代精品。除器物本身的藝術價值外，兼顧其歷史藝術及考古價值。
- 三 本集內容分三個部分：一爲專論，二爲彩色圖版，三爲彩色圖版說明。
- 四 爲方便國內外學術界讀者，中文版全部用繁體字排印。

三 集大成的金銀器之進一步發展和繁榮

楊伯達

蒙古、元、明、清（公元一二〇六——一九一一年）

宋開禧二年（一二〇六年），蒙古鐵木真被各部落推舉為成吉思汗，是為蒙古建國之初。至一二二七年，忽必烈汗建都燕京，更名大都，改國號為元。在此六十五年間，蒙古鐵騎滅西夏、金，三次西征至東歐，成立欽察、窩闊臺、察合臺、伊兒等四汗國。一二七九年滅宋，君臨中華。隨着蒙古鐵騎打開了通向西方的大門，中西交通更為便捷，他們不僅獲得了大量的珍寶玩器，西方寶石的工藝和知識也傳入蒙古。蒙元統治者還驅使從歐洲、中西亞洲以及西夏、金等地擄掠的各族金銀匠人為他們打造了大量的金銀寶石的首飾、佩飾、飲食器和車馬具等。這些貴重的金銀器除了在戰事和日常生活中消耗之外，還殉於墓內，由於蒙古施行秘葬，地表不留任何標記，所以迄今為止，蒙古汗和各級首領墓葬的確切地點仍不為人所知，也無從主動發掘。偶然發現的傳世或出土的蒙古文物極少，金銀器更是如此，我們今天所見者不過是其中的只鱗片爪而已。這有限的幾件蒙古汗金銀器，雖然未能充分地體現出中原統一風格的繼續發展，但仍是有迹可尋的。當然，這種金銀器統一風格的進一步發展和繁榮，在元、明、清三代金銀製品上表現得更為明晰。

一、蒙古汗金銀器（公元一二〇六——一二七二年）

如上已述，蒙古汗六十五年間流傳下來的金銀器甚少，現今僅見有杯和馬鞍飾件。杯均為金製，有兩種，一是高足杯，另一是鑿耳杯，都具有蒙古騎馬民族之特色。

高足杯兩件器型基本一致（彩圖一、二），均為深腹、喇叭形高足，因其曲直、輕重均十分適中，故其器顯得平衡穩重、淳樸敦實，反映了蒙古族的民族個性及其固有的審美傾向。這種審美觀不僅主導着金銀器的造型，也影響着當時蒙族陶瓷、木、石器的造型，鑿刻蓮紋高足金杯（彩圖二）口沿飾捲草紋，杯身飾菱形開光折枝蓮紋，因其用繩索捆成一把，便俗稱把蓮。蓮花在漠北大草原水泡子岸邊經常可以看到，蒙古牧民也是喜聞樂見的，常用於金屬、木、石及皮革等器物上作裝飾，其表現形式與此杯圖案相通，或略有損益。此杯上的折枝把蓮的構圖與形象一見便知是宋金之金銀、陶瓷器上慣用的圖案，並不感到有何蒙古特色。這就是蒙古汗時期的金銀器很可能多為被俘的宋金工匠所打造，故此金杯雕鏤宋金之菱形開光把蓮圖案則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久而久之，即變成蒙古族圖案，這也就是蒙古汗的『拿來主義』的產物。舉凡我國邊疆地區民族，無一例外地實行『拿來主義』，如飢似渴地吸吮中原文化成果為己所用，一旦取得中原政權之後，一切歸為

已有，便盡情享用漢族文化的成果，並將本民族文化與漢文化融為一體，這就是中華文化多元性、統一性的歷史的社會的基因。

鑿耳杯的造型是扁體、淺腹，一側有較寬的鑿耳，耳下置一環，可稱鑿環耳。鑿環耳杯便於騎馬時攜帶，執用時可維持平衡，較為省力，蒙古汗也喜歡鑿耳杯。鑿耳金杯（彩圖三）造型敦厚堅實、飽滿平衡，邊飾捲草，鑿飾纏枝牡丹紋。花瓣式鑿耳金杯（彩圖四）作六弧形，鑿耳也取三弧形，可謂器、鑿協調、相得益彰。至此，可知鑿耳杯造型并非單一，也是多姿多彩，相當完美，至南宋已地不分南北普遍使用。想必此兩件鑿耳杯也是從宋金傳至漠北而被蒙古汗所接受，並樂於使用。牡丹花紋此時已不是漢族獨享的圖案，至遲在五代、兩宋時期它已成為邊境各民族與內地漢族共愛、共用的富貴花。契丹族使用牡丹花紋絕不亞於中原漢族，繼承唐、宋及遼、金、西夏的蒙古汗愛用牡丹花紋也是順理成章的，完全符合其審美心理和生活習俗。

蒙古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馬就是他們的生存依靠和生活夥伴，為了游牧騎射之方便，韁鞍之類用具則是不可缺少的設備，也是他們最喜愛的器物。馬鞍以木材為骨，並施以其他材料的裝飾。遼陳國公主墓殉葬的兩套銀馬具足以說明草原民族對馬具的重視。蒙古族對馬具的喜愛絲毫不遜於契丹族，當然，蒙古汗金馬具是什麼樣子我們現在還很難揣想，但從內蒙古錫林格勒盟鑲黃旗烏蘭溝蒙古貴族少女墓出土的金馬鞍飾（彩圖五）上便可窺知其一斑，其前後橋的主紋是鹿紋，牡丹花紋為邊紋，中心仍是菱形開光，內施欲起伏卧鹿，此種鹿不取唐、宋、遼的珍珠盤角（亦稱肉芝角），而採用枝杈橫生的大角。馬鹿的姿態抓住其右前肢已伸出將要站起的一剎那，真是惟妙惟肖，非熟悉馬鹿習性的富有藝術天才的匠人莫能為，這種善於表現捕捉獵物瞬間動態的藝術手法傳至漠北終成蒙古汗時的藝術模式。

二、元代金銀器（公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年）

蒙古汗在六十五年東征西討、開疆闢土的過程中，隨着財富增多，其爭權奪利的內訌亦無休止。在爭奪皇位的內戰中忽必烈汗取得勝利，他率部離開了蒙古族生息繁衍的故土，到達北方重鎮燕京，並以其地為都，改國號元。忽必烈坐上元朝第一代皇帝寶座之後的第八年滅南宋而統一中華。世祖忽必烈採取了蒙元傳統的民族歧視政策，奉藏傳佛教為國教，拜吐蕃高僧八思巴為國師，在全國推行藏傳佛教，廣建寺院，喇嘛激增，為元代金銀工藝打上了藏傳佛教的烙印，金剛降魔杵紋首飾盒（彩圖六）即其例證。蒙元統治者信賴重用色目人，排斥壓制廣大漢族文人，建立了龐大的官辦、軍辦手工業生產體系，束縛了私人手工業的發展。為了發展陸海通商貿易，開闢財源，輸出大量的絲、茶、陶瓷等商品，換回香料、胡椒、寶石等生活用品和奢侈品，以滿足蒙古統治者豪奢糜爛的生活需求，同時也刺激了金銀與珠寶工藝巨大的同步發展，促使我國傳統的金銀工藝與外來的寶石工藝結合起來成爲一種新型手工藝。統治着中華文化中心區域的蒙古草原騎馬民族的固有民族氣質漸趨消逝。元代金銀器工藝的發展趨勢亦與上述情況類同，在其金銀製品中很難找到邊疆民族的特色，而是逐漸被中華金銀器的統一風格所融合，並納入了集中華文化之大成的金銀器發展軌道。

元代生活用金銀器有高足杯、鑿耳杯、龍柄銀杯和玉壺春銀瓶等器。高足杯幾與蒙古汗時期一致，器身稍內收者（彩圖一一）與口稍大、身略矮者（彩圖一四）顯示了某些細微差別，有紋者也是菱形開光平鈹牡丹花，以鑿點紋為地（類似明代沙地），也與蒙古汗金器圖案相同。雙龍戲珠紋鑿耳杯（彩圖一三）之鑿呈半月形，平鈹二龍戲珠紋，其龍與中原傳統龍紋相比較則大有異趣，如大頭、蛇身、二足、魚尾。靈芝頭形大鼻、小鈹形角、中趾甚長而尖利的三爪等等都是它的特點，疑其與摩竭不無關係，這種龍形在中原龍中還未找到類似者。上述二種金杯形飾均與蒙古汗時期相似，確由其演變而成，惟器胎略嫌輕薄，在用金量上較蒙古汗時期有所核減，可能是受物主的品級和富足程度制約所致。龍柄銀杯（彩圖八）身扁，四瓣花形，一側安一龍首銜活環柄。龍作大鼻頭，閉口、眼微合、眉長、雙角尤長、角尖上捲。其龍神態安詳溫順，活像一隻在合眼的老綿羊。莫非此龍反映了蒙古游牧民族樸素的審美觀？打造此器的工匠是否也是蒙古族或其他游牧民族出身的人？銀玉壺春瓶（彩圖一五）其頸稍細，腹略鼓，口較大，外侈，圈足微外撇，襯托器外輪廓綫形成長長的『S』形，格外秀美婀娜，也是傳自宋代銀玉壺春壺的造型。金銀首飾是蒙古族婦女所喜歡的裝飾用品，有簪、釵、墜、項圈（彩圖九、十、一二、一六—二〇）等器，其中雙龍戲珠鍍金銀項圈（彩圖九）富有蒙古族色彩，想必也是出自蒙古族工匠之手。簪、釵、珥等金飾與中原金文化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似從南宋流傳至元代。鑲綠松石金耳墜（彩圖一八）則有着漢晉北方草原民族常用的金絲鑲綠松石耳飾那般的形飾與作工，可知一種金器一旦成為廣大群眾所接受的『模式』之後，其生命力是很強的，在相當廣闊的地區可延續數百年之久。

元代佛教用金銀器傳世尚少，所見銀菩薩坐像（彩圖二五）從其寬肩細腰判斷應為藏傳佛教造像，與明清兩代藏傳佛教造像迥異，可能出自蒙古喇嘛匠人之手。金飛天頭飾（彩圖二六）遙接唐代飛天之衣鉢，作昂首狀，上肢前伸，上裸，俯身，雙腳心朝上，頭戴花冠，佩長至足後的瓔珞，着天衣，下裳隨風飄揚，翱翔於蒼穹中，是十分成功的造像類金工藝佳作。

江南地區富有的官吏豪紳死後往往陪殉大量的金銀器和玉器。通過這些出土的金銀器我們可以瞭解其墓主的社會地位、承造店鋪或工匠姓名及其彼時金銀工藝的發展水平。江蘇吳縣黃橋鄉元宣慰副使呂師孟夫婦墓出土了金碗、金盤、金香熏、金帶飾、八棱銀果盒、銀盃、銀扁盒、銀圓盒、梅花銀盒、小銀盒、銀水盃、銀尊、銀匙等二十六件金銀器，另有小金飾十二件。呂師孟卒於大德八年（一三〇四年），其妻卒於皇慶二年（一三三三年），葬於延祐二年（一三一五年），此為所有該墓所出金銀器之下限。纏枝花果紋金帶飾（彩圖二八）共九銙，是呂氏生前所繫金鈎革帶上的飾件，框內飾五枝起突的葡萄狀紋，是延用宋代金鈎形式而更加纖巧。人物故事金飾件（彩圖二九）是描寫文王訪姜太公的歷史故實。姜太公、周文王及侍從二人皆作起突處理，前作河沿，背為樹叢，取平遠式構圖，合乎章法，是用金葉打造的一幅圖畫，繼承宋代金匠的手筆，惟人物比例不够準確，出現頭大身肥的缺點，較宋作品略有不及。這不是一個好兆頭，說明元金銀匠對人體比例不如宋人那般重視。金『聞宣造』款纏枝蓮雲紋盤（彩圖三〇）形制奇瑰精緻，由四靈芝組合成尖角連弧邊方盤，盤心起突四尖瓣花蕊，通身陰鈹各種折枝花卉，綫條剛勁流暢，可知聞宣確是一方名家，絕非平庸之輩。此盤前無來龍，後無去脉，堪稱孤品。另一件銀『聞宣造』款六瓣盒（彩圖三三）光素無紋，以其六弧花形取勝，器身未經研光，故疑其為未作平鈹花紋的器胎，或因殮尸之需便倉促殉入墓內。銀『沈二郎造』款團花盒（彩圖三二）有蓋，折肩，平底，扁盒，蓋上陰鈹五朵花卉紋。這種折肩扁盒在金銀、銅鐵、陶瓷等器中都難尋到

與其相比侷者。無錫錢裕夫婦合葬墓出土金器有杯、簪、箍形飾、帶飾等六件；銀器有瓶、盒、渣斗、帶流杯、盆、碗、篋、匙、匕、罐、髮罩、挖耳等共四〇件。錢裕是沒有官職的一介士紳，卒於元祐七年（一二三〇年）。由此可知元代無功名的士紳也可置朝廷禁制於不顧，公開地使用金銀器。錢氏墓所出金銀器有『鄧萬四郎』、『陳萬四郎』、『東壽壺郎』工匠款和『筱橋東陳鋪造』作坊款，均有研究資料價值。金『陳鋪造』款獾紋帶扣（彩圖三四）為葵花形，中飾隱起行走回首的獾紋，前有長方形扣環，麻地襯托獾紋使其更顯突出。背上有『陳鋪造』十分金』銘，出於錢裕腰部，應為其生前繫用的革帶金扣飾。金『鄧萬四郎』款高足杯（彩圖三六）光素，內心平斂持蓮童子，杯外唇模印『鄧萬四郎十分赤金』銘，係錢裕生前所用之酒器。此杯源自蒙古汗高足杯而腹稍淺，說明民族間的文化交流直至融合往往是雙向互為吸收，融為一體的。銀『陳鋪造』款花瓣形蓋托（彩圖六二）均取花形，類似四川彭州南宋窖藏出土的芙蓉花蓋托，僅其出尖花瓣稍有不同。『朱碧山造』款銀槎杯兩件，其中一件一九七二年吳縣藏書樓公社光大隊出土（彩圖三七），另一件為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清宮遺存之物（彩圖三九），槎尾刻『龍槎』二字，腹下刻五言絕句一首，尾後刻『至正乙酉』年款及作者名款。朱碧山，浙江嘉興人，以擅製精妙銀器而著稱。據此兩槎之銘文可知是朱碧山製於至正五年（一三四五年），可供讀者對比欣賞研究。

安徽安慶范文虎夫婦合葬墓出土了一批金銀器。夫人陳氏大德九年（一三〇五年）卒，金髮冠（彩圖四〇）即其髻飾，如蚌形，上下相合，均飾平斂雙鈎捲草紋。合肥小南門原孔廟舊址窖藏及六安花石咀一、二號兩墓出土金銀器均為士庶縉紳所用之物（彩圖四一—四六、四七—五七），其中亦不乏佳作，如銀雕花蓋托（彩圖四九）之蓋與托為原配，小蓋通身錘鑿折枝菊花、山茶等花卉，兩側各立一仕女作雙手抱盞狀，托盤作折沿，淺腹平底，亦飾隱起花卉，這種雙仕女耳在傳世玉器中有類似者，在銀器中則非常罕見。

銀折沿盤（彩圖五八）形制單純，光素無紋并有傷裂，然其底刻『戊寅』及八思巴文二字款值得重視，凡元代有兩個戊寅年：一是前至元十五年（一二七八年），另一是後至元四年（一三三八年），八思巴文二字款為『造』及某官府『押』，故可確認此盤為元代某官府所造。銀月梅圖梅花形盤（彩圖五九）富有詩情畫意，湖南也出土過幾件。南宋已有月梅圖飾銀盤，可供對比欣賞研究。銀鍍金獅紐蓋玉壺春瓶（彩圖六一）以其雄獅紐蓋，五一點五厘米的高度及其平凸垂雲紋凹刻菱形開光等凹凸起伏的圖案而有別於同類銀器，其身修長嬌嬈，其腹下垂豐碩，應為元代玉壺春瓶的典型性造型。

元代湖廣路是通向海南的必經之地，經濟也比較繁榮，地近常德、澧、辰、沅、靜等金銀產地，原料充足，保證了金銀打造業發展的需要。二十世紀後半葉，湖南省常德市及其附近便出土了大量的金銀器。出土金銀器的地點有臨澧縣新合鄉龍崗村（彩圖六四—一〇八）、澧縣澧陽鎮招待所、珍珠村、雙龍鄉花廟村、澧南鄉、津市市涇沅農場、青龍嘴、石門縣雁池鄉邱家灣村、慈利縣零溪鄉墨凸村、古村凸、沅陵縣、益陽縣八字哨、株洲縣堂市鄉黃龍村、醴陵市、漣源市石狗鄉石洞村、攸縣丫江橋河源村老屋組、桃水鎮諸家橋村王家組等地。出土的金銀器有盞、托、杯、碗、碟、簪、釵、髮插、頭飾、鐲、盒、罐等，其中頭飾較多是其特點。款識銘文不多，計有『十月初八廖卿』書款、『壽』、『□四郎』、八思巴文款、『癸未季春』、『山谷老人』五言詩題、『董壽』、『澧縣羅長興榮加恰足赤兔』、『至正十三年』、『陳雲飛造』、『陳國佐作』、『庚辰歲華仲置』等十六器。另有顯示異國情調的髮飾。金菊瓣紋杯（彩圖六四）形似開放的雙重長

弧瓣菊花，墨書『十月初八廖卿』銘，廖卿即其所有者。單耳瓜楞形金杯（彩圖六五）器身似切開的瓜形，圈足，瓜葉蔓耳，富有莊園氣息，杯底刻一『壽』字。同出一銀碑形紐的朱文八思巴文印（彩圖一〇八），經考認定漢字『董壽』二字，疑其金瓜楞杯上的『壽』字當為『董壽』之漢名字，應為『董壽』所有之器。『董壽』係何許人已無從考證，以其印柄光滑油亮來看顯係曾頻繁使用，用八思巴文圖章的南人也是異乎尋常的，故董壽其人可能是元朝地方衙門的下層官員，如達魯花赤幫辦之類。此臨澧龍崗村窖藏的金銀器很可能是在董壽授意指使下將其所有的金銀器皿瘞埋於此的，埋下一枚印章更是用心良苦，其目的是不言而喻了。董壽金銀器中婦女的金簪釵等首飾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為數甚多（彩圖六九—九四、一〇五、一〇七、一〇九、一二五—一二八），花色款式豐富多彩，樣樣俱全，可謂元代金簪釵之集粹。以其外形論，可分為圓、如意頭、橢圓、孔雀翎形、梭形、長方形、倒三角錐形、鳳形、錢串形、萱花苞形、帶耳勺形等，內中有鑲嵌寶石、綠松石或玉的。從工藝上說也是無所不包，如捶絲、扭絲、盤絲、鑿刻、鏤空、掐絲、焊炸珠、纒絲、仿連珠、兼用多種金工藝。從裝飾題材來分，有蓮、牡丹、菊、盆花等花卉；鹿、兔等動物；雲水、龍鳳、螭虎、麒麟等祥瑞圖案。這是一批不易多得的元代女性頭飾，顯得十分珍貴。

金雙耳勺頭折枝花果扁長柄簪（彩圖七四）：身細長，十花、柄背鑿刻八思巴文，可能是供給蒙古官員夫人所用。這種金簪插在婦女髮髻之上，其簪頭等大部要露出髮外，同時要插數枝。金單耳勺盆花扁長柄簪（彩圖七七）：盆花分為兩枝十朵花卉，簪身細長，柄上鑿捲雲紋，背面鑿刻『癸未季春』及八思巴文。元代有二個癸未干支年，分別為前至元年二〇年（一二八三年）和至正三年（一三四三年）。相同的還有一件金長身勺形釵（彩圖七六中）。金雙螭捧花紋簪（彩圖七一）：釵首作長身勺形，內飾鏤空雙螭捧牡丹花紋，雙長圓對稱足，末端鑿刻『□四郎』印子款，應為工匠款。金如意頭形鏤空麟鳳紋簪（彩圖八三）：如意頭作七連弧形，中間作尖瓣，內飾鏤空飛翔的鳳和奔馳的麒麟，襯捲雲紋，在方寸內刻畫飛鳳馳麟是精巧之作，難度甚大。金龍眼紋金簪（彩圖六九上）：簪頭飾隱起的兩隻汁肉飽滿的龍眼果，周邊襯花葉。與其類似的有金雙荔枝果紋長方形簪（彩圖八八上），二者均以新鮮果實為主紋，這也是宋元圖案的新題材。金鏤空鳳紋鳳形簪（彩圖七八、七九）：作飛翔的鳳形，可能用於髮髻之側面，扁足一面刻八思巴文。金鏤空鳳紋釵（彩圖八四左）：立鳳展翅欲飛，外形近圓，飛鳳鈎喙、蛇頸，長翅似雕，形近唐鳳。金連環飾釵（彩圖八〇）：金釵首部飾九個圓片，或直或彎曲。金并蒂形釵（彩圖九一右）：釵頭為五朵并蒂花，形似燭臺。尚有并蒂花多至十幾枝排列者（彩圖九二）。這種并蒂燭臺式金釵見於南宋，元代原封不動地繼承下來，仍有市場。

鑲嵌玉的有鏤空玉鳳金釵（彩圖八四上），鑲嵌綠松石的有三枝（彩圖九三、九四），松石都帶近黑色的鐵綫，可能是河西甸子。金掐絲纒絲焊金炸珠鑲寶石簪（彩圖七〇、八九右、九〇）共五件，其中掐索紋絲焊金珠鑲嵌寶石金簪共二件（彩圖八九上、九〇下），其圖案是五『拜丹姆』紋，中心圓形，『拜丹姆』紋均為三大二小穿插組合，這純屬中亞圖案，伊斯蘭化之後仍盛行不衰。另三件的外形作上寬下窄的圭形，圖案結構繁密，以桃、『拜丹姆』、五瓣花、闊葉、盤絲紋組合而成，掐絲之間焊纒絲，掐絲周圍也焊金珠，玲瓏華麗，異國情調甚濃，想必可能都出自四蒙古汗國工匠之手，或直接地、間接地來自四蒙古汗國（彩圖七〇、九〇上）。銀八方圈足杯（彩圖九九）：杯

口爲八方尖口，口下作方格陽紋框八方，以下爲圓形，半高喇叭口式足。方圓結合的造型在單純之中顯出變化，以陽綫（即弦紋）作過渡，使方與圓巧妙連接，渾成一體，無懈可擊，宛若天成。杯底刻『山谷老人《題浯溪圖》』五言詩一首。山谷老人即北宋著名詩人、書法家黃庭堅（一〇四五—一一〇五年）。庭堅，分寧（今江西修水）人，字魯直，號涪翁，又號山谷道人，偶見自題山谷老人款，其《浯溪圖》詩見於《山谷集》卷八，與《題浯溪圖》刻詩小有出入，今引錄於下：

『成子寫浯溪，下筆便造極，空濛得真趣，膚寸已千尺。祇今中宮寺，在昔漫郎宅，更作老夫船，檣竿插蒼石。』（華寧女士提供）

《浯溪圖》不知何時失傳，我們已不能目睹展觀，僅可從銀杯刻詩和《山谷集》錄詩玩味其『下筆便造極，空濛得真趣』的筆墨情致和蒼茫意境。那麼刻詩與集詩爲何在用字上又略有不同呢？想必刻詩是初稿，很快便傳出，經多次轉抄難免筆誤，刻詩祇不過是流傳過程中的一種傳抄本而已。一般說詩集多經加工潤色後方付梓問世，《山谷集·浯溪詩》很可能也是經過作者加工潤色後才定稿的。可以認爲前者是傳抄稿，後者是定稿，兩詩稿同時展現在讀者面前，可供比較研究。從這一角度也可窺知元代文人在銀器創作中起到的積極作用，銀器藝術風格文人化的趨勢也是不可阻擋的。

金扁莖手鐲（彩圖一〇九左）工藝極其簡單，但有銘文，其文爲『澧縣羅長興榮加恰足赤兔』。記明此金鐲成於澧縣之羅長和榮加恰二匠。此鐲出土于澧縣澧陽鎮，與此銘關係十分密切，很可能即在出土地點生產的。月梅紋是元人較爲喜歡的圖案，應用於各種工藝品上，除了前述的一件之外，在澧縣珍珠村還出土了銀月梅紋盞（彩圖一一〇）與銀托（彩圖一一一），若有幸摩挲鑒賞也是饒有興味的。銀乳釘紋雙耳簋（彩圖一一三）係仿西周青銅簋而製，說明仿古思潮繼續滲透到元代銀工藝行業。銀蓮瓣盞托（彩圖一一八）：盞爲一片蓮瓣舟內一人撫膝而坐，橢圓形托盤內作翻滾的波濤，意示一仙人乘蓮瓣舟逆風衝浪航行的神話故事。此類盞托極爲罕見，尤其不失原裝，完整配套甚爲難得，堪與朱碧山神槎相媲美，兩者立意相合，僅在作工上有繁簡之別而已，可知銀器的文化底蘊并非膚淺。神槎與蓮瓣舟盞托在同一時代出現，標志着文人介入銀器工藝生產，促其走上鑒賞化的文玩道路，說明文人銀器已在以帝王富豪爲主流的金銀工藝舞臺上占有一席之地。銀七事件（彩圖一二一、一二二）是草原游牧文化與中原農業文化相融合的產物，北方游牧民族長期過着騎馬生活，便將日常生活所用之瓶、罐、香熏、剪刀、酒葫蘆、鱗、火鏢等等器具繫佩於腰帶上，便於隨時使用，以常用此七件器具爲由，故稱『七事件』。這二套七事件雖爲明器，因其組合不完全相同，亦可作對比研究之參考。

銀『至正十三年』款菊花紋托（彩圖一二四）：此圓托以重瓣菊花爲飾，托內心刻『壽』字，次刻『長命富貴』、『金玉滿堂』等古語銘，沿圈足內側刻『至正十三年福生張昆□三記』小楷字，有銘二十一字，在元代金銀器中還是不可多得的，對研究元代盞托圖案還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的。『金玉滿堂』、『長命富貴』銘二枚金幣（彩圖一三〇）是吉語幣形器，不是流通的貨幣，含金量僅七、八成，楷體字尚屬工整。這種金幣與上述『至正十三年』銘菊花紋銀托的銘文一樣，都表達了元代士庶百姓追求人生幸福的願望。銀『陳雲飛造』款摩竭耳杯（彩圖一三二）：此種小銀杯有菊花耳、牡丹花耳、瓜耳、靈芝耳等多種形式之耳，小巧別致，玲瓏可愛，用作飲酒器，此摩竭耳則兼有濟世救苦的含義。銀高足杯（彩圖一三三）是蒙古族喜用的馬上飲器，後在全國普及。此杯淺腹，是元後期高足杯的特徵，其菱形開光牡丹

花紋也是蒙古族常用的圖案，從器型紋飾來看都是元代後期具有代表性的銀器。銀并蒂花飾釵（彩圖一三六）流行於湖南各地，四川也出土過相類似的南宋銀釵。此銀釵共飾二十五組并蒂花，可能是此類銀釵中花飾數量最多的一件。銀群仙祝壽圖盤（彩圖一三八）盤心刻雙鉤「福壽」二字，上有玉皇大帝，左、右、下各有二仙，共十仙，可能是「八仙」和「和合」二仙，故名「群仙圖」。八仙題材雖成於明代，但不見八仙祝壽之類畫幅，故此圖可能是八仙祝壽的最早版本。在盤的折沿下刻有「陳國佐作」工匠款。銀「庚辰歲華仲置」款匜和銀玉壺春壺（彩圖一四〇、一四一）：華仲是物主姓名是無可爭議的。庚辰干支年元有兩次，即前至元十七年（一二八〇年）和後至元六年（一三三〇年）。究竟是哪一庚辰呢？此兩器器型以玉壺春瓶最為持久、最為普遍，以它為標準可以幫助我們判斷庚辰款的確切年代。從玉壺春壺頸長而細，腹略下垂而形成器體修長的特徵來看應為元代後期之作，與後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年）的年代相契合，定於此年是比较妥當的。銀菊瓣紋杯（彩圖一四二、一四三）是元代士庶偏愛的酒杯，菊花氣味清香，令人精神清爽，故屈原、陶淵明等大文豪均以詩賦頌之，儘管菊有單瓣、復瓣之分，裝飾也有簡繁之別，尤其杯口坡度亦有不同，但均取其剛剛綻放清香四溢的狀態，又均作半高喇叭口狀足，不僅穩重大方、秀逸莊重，而且還便於持飲放置，不會傾倒。這是兩件既實用又美觀的菊花銀杯。銀芙蓉花盞托（彩圖一四六）：重瓣，外層十二瓣，內層八瓣，中心是起凸的由三瓣花片包着的花蕊，雙層花瓣互為疊壓，以游絲般的細綫勾勒其細部，流暢生動。此銀托出於湖南漣源石狗鄉石洞村，與四川彭州蓬安等地所出之南宋金銀托盤幾近一致，故其造年亦接近南宋，或本來就是南宋之器。銀行旅圖釵（彩圖一四八）也是出土於漣源石洞村，此釵頭近圓形，直徑三厘米，尚不足寸，在這種其狹小的空間刻畫出極為繁雜的景象：旅者騎驢回首，侍者肩負行李，驢後有杏枝一株，樹後設一茅屋，旁邊有一面樹起的酒簾（酒幌子），門前置一案，案頭置一酒罇，一婦女托腮而望，儼然是一幅旅行圖軌扇畫面，可知此器的作者具有一定詩文修養和繪畫功底，否則很難打造出這隻富有詩情畫意的銀髮釵。金菊苑仙女圖釵（彩圖一四九）的圖飾也像一幅充滿詩意的圖畫，仙女漫步於叢菊之中，如果沒有隨風飄起的天衣確實就是一位美麗俊俏的仕女，若以雕塑藝術的法則來衡量，此仙女也完全達到了形神兼備的高標準。

關於元代西南少數民族金銀器的情况，因受資料短缺之制約，我們所知甚少，如凉山彝族銀水壺（彩圖一五七）：壺體扁圓，圓形管口，有蓋，橢圓半高喇叭口足。側面各有二扁環形組用於穿繫背帶，出行時背在肩上。清官將這類壺稱為措壺，其造型與此壺相似。壺面圖案祇有一鳥，經過了抽象變化，從其剪刀形尾可認為它是一隻展翅飛翔的燕子。其他圖紋都是大小圓圈組成的環形，或飾直綫、橫綫及斜綫，其內涵亦無從判斷，我們期待着能够聽取民族學者的科學見解。

上述元代金銀器中含有朝廷官員呂師孟、范文虎等生前所用的金銀帶跨及其夫人用的首飾、梳粧用具，都是合乎朝廷定制，與其官職相稱，我們從中可以瞭解朝廷用金的一些情况和它的工藝特點。但是這些官吏所用金銀器也未必均出自官辦手工業作坊，這一點確與流傳至今的唐代金銀器的情况不同。迄今我們尚未見到『諸路金玉匠總管府』、『杭州路金玉總管府』等官辦金銀作坊打造的金銀器物，所見一批各式酒盞、托、杯以及婦女所用的金銀簪、釵與鐲，其物主都是士庶及其妻女，其打造的具體地點可能都是各路州府的民間金銀作坊。這些金銀器成爲商品在市場上流通，允許庶民自由購買。譬如江蘇無錫市錢裕墓出土了其生前使用的『陳鋪造』款獾紋金帶扣和春水圖飾玉鈎環

等金玉帶飾都是違禁的，錢裕從未做過元代官吏，不過是一介地方豪紳文人，無權佩用金玉，但他與無錫縣達魯花赤過往甚密，便可不顧朝廷禁令繫用玉或金的帶飾。政府禁止庶民使用金玉的法律遂成了一紙空文，無人遵從，廣大庶民在商鋪和作坊裏購買所需之金酒器、香器或金簪釵等首飾便禁而不止了。由於我們今天尚難找到蒙古統治者使用的金銀器，關於這方面的情况祇好暫付闕如，僅可從庶民所用金銀器的遺存以了解元代金銀器的概況。我們也很難看到鑲嵌珠寶的元代金銀器，這同樣是一件憾事，也只能等待今後有所發現。

三、明代金銀器（公元一三六八——一六四四年）

明代仍立法規限制庶民用金，僅在用銀上小有鬆動。金器由皇室成員大量使用，流傳至今的遺物也較多。帝后用金銀器以萬曆帝后所用者留存最著。出土於各地朱姓親王或异姓親王生前所用的金銀器也頗多，內有諸王所用的金冠、器皿及王妃所用的鳳冠、首飾等等。明皇家、親王所用金銀器往往鑲嵌紅藍寶石，后妃所用金首飾也多用纍絲鑲寶石工藝，這一點似乎與元代民間首飾不同。其實不然，我們從與元代相關的著錄中可以找到記載元代寶石使用情况的條文，其寶石均來自阿拉伯，其名稱也多是從阿拉伯語直譯的，可知元皇室、貴族也都大量佩戴鑲紅藍寶石、貓眼石等的金首飾，而明代皇家金器正是繼承了元代皇家寶石金器的作工而又有所發展。所見明皇家鑲寶石金器有永樂年所造者，出土的萬曆年間金寶石首飾也很多，這可反映明皇室打造的金寶石首飾的藝術趨向。江南地區富有人家則將朝廷禁令置之度外，大量地佩戴金寶石首飾。可以相信，金寶石首飾在全國經濟發達、工商業繁榮的大城市已經比較普遍地推廣并為婦女們所喜愛。

金纍絲鑲寶石鳳形簪（彩圖一五九）是明憲宗（一四六五——一四八六年）寵妃萬貴妃為其父萬貴及其母的陪葬品，此簪作一展翅開屏的鳳凰形，纍絲工藝精巧細緻，是明初皇家纍絲工藝的佳作。鳳凰之胸前、雙翅與背上均鑲嵌紅藍寶石，經包鑲之後焊牢於纍絲之上，其紅藍寶石色淡而不够艷美，雖非優質寶石，但出自明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皇家『銀作局』，還是有其樣板的科學價值的。『銀作局』為宦官二十四衙門即十二監四司八局中的一局，專掌打造金銀器飾。此簪的工藝水平應屬該局上乘等次，可能是成批產品中的一件，以便分賞給內廷眾多的嬪妃。

金『宣德九年玖月內造』款鑿雲鳳紋瓶（彩圖一六〇）：侈口長頸，小肩斜腹，平底，爐瓶三式中常用此型瓶，陰刻雲鳳紋。此器銘款為『隨駕銀作局宣德九年玖月內造』，『隨駕銀作局』是指跟隨宣德帝出巡時臨時組成的銀作局，查《明史·宣宗本紀》，宣宗確於九年九月癸未將巡邊，乙酉至居庸關，丙戌狩獵空道，丁酉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己亥大獵之後於冬十月丙午還宮。此金瓶即在宣宗九月巡邊至大獵期間由隨行的銀作局匠人在路途之中倉促造成，可知其工藝水平不會很高。

萬貴（萬貴妃之父）墓所出無款金器從其形飾判斷應為成化年間所造之器，可能出自京城金鋪。萬貴卒於成化十一年（一四七五年），所殉金器應為成化或其前之物。金太白醉酒八仙紋盞（彩圖一六一）：盞八角，每面陰鏤一仙人，八面合為八仙圖，即使不是最早的八仙圖

也應是較早的八仙圖，形象生動，綫條流暢，宛若一幅白描八仙畫冊。盞內有太白坐像，冠服不古，或有象徵閣老萬貴之意。金鑿人物八方盤（彩圖一六二）：內鑿樓閣人物圖，作者運刀嫺熟，功底深厚。金鑿花七事件（彩圖一六三）：計有剪、火鑲包、刀篋筒、罐、盒、瓶、觸等七件日常使用的小型器具，繫於腰上。七事件來自騎馬民族的韃韃七事，唐武官五品以上佩韃韃七事。唐太平公主具紛礪七事而在內廷首開其例。本是武官標志和飾件可與元代銀七事件比較觀察，知其所繫器什之變化。金鑿紅寶石無量壽佛（彩圖一六五），明永、宣兩朝爲了羈縻安撫烏斯藏，鑄造了大批藏傳佛教造像和法器頒賜各寺大喇嘛。此無量壽佛即其中之一尊，面容安詳，大慈大悲，是典型的漢相藏傳佛教造像，與無『梵相』、『番相』造像不同。清乾隆十八年重修白塔寺時供奉藏塔內，一九七八年大修時在白塔塔頂發現，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乾隆朝中正殿撥蠟喇嘛遵旨依模鑄造的可能。

明代歷朝皇帝即位後便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爲親王，於各地建立王城王府，親王死後於封地建陵墓。據《明史·諸王表》載，洪武時封二十四王，燕王後尊爲帝系，而實得封者二十三王；建文時封三王；永樂時封三王；洪熙時封八王；正統時封七王；成化時封十王；嘉靖時封一王；隆慶時封一王；萬曆時封四王；崇禎時封二王；共六十一王。王之孫襲封，如朱元璋嫡二子棧洪武三年封，十一年就藩西安府，二十八年薨，傳嫡庶子孫共十一代，直至崇禎末陷於農民起義止，長達二七三年，幾與明享祚之年相當，僅短少四年。這些遍布全國各地的明親王陵墓中的一部分於二十世紀下半葉已被發掘。明代還封與朱元璋共同打江山的元老功臣『殆逾百數』，『存者不及三、四』。顯赫者有魏國公徐達（傳十一世）、鄂國公常遇春、韓國公李善長、曹國公李文忠、信國公湯和、西平侯沐英（傳十一世）、誠意伯劉基（傳十三世）。這些同姓和異姓王侯死後，均按明代制度瘞埋了數量不等的金銀器，由考古工作者正式發掘或群眾在生產中發現後出土，經徵集入藏而重見天日，爲我們研究明宮廷金器工藝提供了第一手資料。

南京市有很多的明初功臣及其子孫墓，出土了大量金器。安慶侯仇成，洪武二十一年（一三八八年）卒，所用銀束髮冠（彩圖一六六）五梁，是迄今所見明代最早的束髮冠。《明史·輿服志》載：『一品七梁……二品六梁……三品五梁……四品四梁……五品三梁……』。此五梁冠應爲仇氏三品冠戴。銀作局洪武三十一年造金髮簪（彩圖一六七）當爲南京銀作局所製，也是明銀作局的最早的款識。魏國公徐達子孫墓在南京市太平門外板倉一帶，徐膺緒（徐達第三子）墓出土雲鳳紋金簪（彩圖一六八）應爲永樂十四年（一四一六年）以前之物。徐達五世孫太子太傅徐備夫人生前所用金冠飾、簪（彩圖一六九—一七三）其工藝、花色各有特點。金嵌寶石葉形冠飾（彩圖一六九）：在錘鑿鏤空地上焊包鑲紅、藍、綠等色優質寶石。金嵌貓眼石六瓣花形簪（彩圖一七〇）則爲掐絲包鑲貓眼石而有別於前者。金雲鳳形冠飾（彩圖一七一）、金菊花鳳紋簪（彩圖一七二）均以纒絲功夫見長，別具一格。徐備卒於正德十二年（一五一七年），這五件金器亦應爲其生前之物，足以代表明中期高級官吏夫人所用金銀器的工藝水平。金雲龍紋帶鈔（彩圖一七四），雙獺尾等共二十鈔，與明定制相符，是難得的一副完整的金帶鈔。從雲龍紋及鈔的尺寸判斷，應爲萬曆朝或其前其後的金帶鈔。金嵌寶石鑲玉佩（彩圖一七五）：雖符合佩之鈎、提頭、瑀、琚、珠、衝牙、滴等定制，但細部形飾變化很大，每飾玉十件，最下邊的金墜包鑲紅寶石，其色濃艷如鴿血。此佩以金爲骨，以玉爲肉，再飾寶石，錦上添花，充分地體現『金玉滿堂』的富貴寓意。從玉之形飾、作工和金器工藝來看，應爲明早期製造。沐英三子黔國公

沐晟所戴雲紋金束髮冠、金簪（彩圖一七九）：形制特殊，無梁，作半橢圓形，正、背、兩側均鑄如意頭形雲紋，兩側各有二孔，下孔為圓形用以導簪，嵌紅寶石花頭金簪已插入，上兩孔為葵花形，此金冠的名稱有待考證。沐晟正統四年（一四三九年）三月卒，此金冠可能是永宣時之作。金束髮冠、綠玉簪（彩圖一八〇）：為沐昌祚墓出土，六梁，綠玉簪導一副。沐昌祚為沐英九世孫，隆慶五年襲侯，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卒。此金冠為明晚期所製。金蟬玉葉（彩圖一八三）：均生動逼真，富有生命力，充溢着文人雅氣。江陰長涇九房巷明夏彝夫婦墓出土金纍絲人物樓閣圖簪（彩圖一八七、一八八），青陽悟空村夏元貞墓出土嵌寶石金鳳簪（彩圖一八九）均為江南民間金鋪所製。與上述皇家、貴族或王公等作坊所製金首飾有着一定的差別，如纍絲拓宕自由、不求工整，包鑲紅藍寶石雖其質量尚好、塊數也多，但形體較小。這都是商品金首飾的特點，也是它的美中不足之處，所以朝野之分確是客觀存在，在品質、作工上均有差別，這是不應忽略的。夏元貞曾任福建甌寧縣主簿，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卒，上述二支金簪的打造年代均應早於該年。

內宮監造、承奉司造金簪形制相似，製造作坊不同。『內宮監造九成五色金壹對壹兩重』銘金簪（彩圖一九〇）漩渦紋帽，釘子形。據《酌中志》載，內宮監為宦官二十四衙門十二監之一，掌國家營造宮室、陵墓并銅錫粧奩器用暨冰窖諸事。『永樂七年十二月十四日承奉司造八成色金簪一支四錢重』銘金簪，承奉司之隸屬，職責均不明，可知各地藩王所用金器之製造作坊有銀作局、內宮監和承奉司三處，內宮監所造金器較承奉司所造者成色好且重。金雲鳳紋香囊（彩圖一九二）：『內宮監造作色金計貳兩重鈎圈金』十四字銘，鳳尾、雙翅、雙肢前伸，長尾翎垂下上捲，與宮廷鳳紋如金鳳釵（彩圖一九一）不同，宛如一綬帶鳥。可知宮廷金器也不是同一模式，其工藝水平也并非均在同一等高綫上。

成化二十三年（一四八七年），憲宗封庶六子朱祐楨為益端王，弘治八年（一四九六年）就藩建府，嘉靖十八年（一五三九年）卒，其墓地位於今江西省南城縣。金鳳簪（彩圖一九五）刻『銀作局永樂貳拾貳年拾月內成造玖成色金貳兩外焊貳分』銘，省略『簪』、『藥』二字。其鳳形似孔雀，可知永樂年間銀作局的藝術水平參差不齊，以至達到令人費解的地步。皇家金器并非都是工精料實者，也不乏濫竽充數之劣品，此即其一例，供讀者管窺銀作局之內幕亦不無益處。八卦銘金錢（彩圖一九七）、魁斗星銘金錢（彩圖一九八）：原為端莊王朱厚燁生前之物。朱厚燁係益端王嫡一子，嘉靖二十年（一五一四年）襲封，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卒。八卦出自《易經》，有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等八種卦形，演繹為八八六十四卦。此八卦金錢（彩圖一九七）僅有兌坎、艮艮、震艮、坎巽、兌巽、離離等七卦，可知不是全器，但其為尚屬首次發現，仍有其研究價值。金北斗星銘金錢（彩圖一九八）：在泉幣上方鑄陽文北斗星名，據《元應錄》載，每扣齒而念一星，星有魁、魁、魁、魁、魁、魁、魁、魁。魁為北斗第一星，魁，魁之訛字，魁即杓字之訛。朱墓出土斗星名金錢有魁、魁、魁、魁、魁、魁、魁、魁六枚，而魁、魁本為一字，亦為重出，實有五星名，缺魁、魁二星名。從魁、魁重出疑為有二副北斗星銘錢，一副僅有魁字銘金錢，另一副則僅有五錢。這種金錢肯定不是流通貨幣，可能與文人科舉有關，詳情待考。北斗星銘金錢也是首次發現，其研究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金雲鳳簪一對（彩圖一九九）：均用纍絲製成，雲鳳為鷄首、短翼、長尾上捲至頭後，整體形狀類似橢圓形，無足，捲雲紋。簪挺內

側陰鏤『銀作局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內造金七錢五分』，每件合今二七克，用金量較以前大為減少。蝴蝶梅花、蝴蝶菊花鍍金銀扣攆（彩圖二〇〇、二〇一）：花與蝴蝶身上均鑲嵌紅藍寶石。這是一種嶄新的金器，可能是朱厚燁妃所用，可以想見這種扣攆必為妃嬪添加光彩。

金鑲寶石蝴蝶、金雲龍鑲寶石簪（彩圖二〇三、二〇四、二〇五）：出自河南浚縣王伯祿太監墓，其寶石的鑲嵌工藝是用包鑲與爪鑲並用於一塊寶石上，爪鑲有三爪或三、四爪不等，這種爪鑲對寶石和金器都有一定的干擾，對視覺也不會帶來舒適感。金舟形火焰光明王像（彩圖二〇七）：出於梁莊王朱瞻堉墓，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封，宣德四年（一四二九年）就藩安陸州，即今鐘祥，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年）卒。此像是漢相藏傳佛教造像，應是永宣時代內廷番經廠作坊所製。明代墓葬從不出藏傳佛教造像，此像是首次出土的金明王像，尤為珍貴。同出的金素執壺（彩圖二〇八）：大蓋，圓口，扁肚，扁圓圈足，流高，柄圓。腹飾隱起桃形紋，頸與流之間裝有雲紋撐帶。此壺敦厚莊重有餘，而缺乏宋元那般嫵媚秀麗之美感。金鑲寶石鐲金條脫（彩圖二〇九）係梁莊王妃生前所用之金飾，條脫均為素面無紋飾，而此條脫施有纏枝捲草紋，工藝上也較為精緻，可能是永樂時期內廷作坊所製。荆端王次妃金鳳冠（彩圖二一一）：形制特殊，類似尖頂草帽形，鑲嵌紅藍寶石共六十一顆，均用纓絲菊花紋包鑲寶石。此鳳冠應為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四月十三日奉敕封為荆端王次妃時由朝廷頒賜的，此時荆端王已死三十六年。金耳勺、金簪、手鐲（彩圖二一四—二一七）出於湘西，僅鑲嵌寶石，無纓絲作工。其中金耳勺（彩圖二一四）之柄鑿刻『景泰貳年十貳月拾貳日』，『景泰』二字有誤筆，估計是一四五一年由邊遠的湘西本地金工所製，其他金器也不會是從省城購入的。金靈芝單耳盞一對、金翔鳳釵（彩圖二一三、二一五）：出自廣西馬山縣古零覃氏土司墓，從器型、紋飾及其作工來看很可能還是明廷賞賜的。金雲紋花形髮冠（彩圖二一八）：出自雲南呈貢沐詳夫婦墓，沐詳是鎮守雲南的右衛指揮僉事、錦衣衛代俸職都指揮僉事，弘治八年（一四九五年）卒。此金冠并非常見的有梁冠，而是八瓣三層花形冠，頂有鏤空捲草紋，左側有二金簪導，右側有一金簪導。這種金冠是首見的一例，從如意頭雲紋來看，很可能還是『銀作局』所製，對研究明代金冠制度與形式大有裨益。金嵌寶石如意紐髮冠、金鑲寶石耳飾均為沐崧之妻徐氏之物。鑲寶石金冠（彩圖二一九）：形式與沐詳金冠近似，也是三重八瓣花式，所不同處是冠為高頂，未鏤空，鑲嵌紅藍寶石，兩側各有鑲寶石金簪導二支，芝頭如意紐亦鑲紅藍寶石。雲紋亦與沐詳金冠雲紋相似，故此二金冠的製造時間應相距甚近。鑲寶石金耳飾（彩圖二二〇）：以二菱形為骨，鑲紅藍寶石各三顆，呈五瓣花形，其上鑲綠松石一粒。寶石的品質、等級比鑲寶石金冠上的寶石高出許多，顆粒也大，可能近水樓臺先得月，憑藉距離緬甸很近的優勢而獲得了大量的優質紅藍寶石，這是沐家的方便之處。金鑲寶石冠（彩圖二二一）：弧頂，四梁，兩側垂直一孔，金簪導鑲紅綠寶石，綠寶石不甚精，正面題『西方淨土』。此金冠應為親王所戴，成都蜀王墓出土了一批金銀器，查明蜀王係洪武十一年（一三七八年）封庶十一子椿為獻王，傳至十世，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年）之後不明。此金冠究係哪一王所有尚待今後研究確認。銀鍍金帶鈎（彩圖二二二）亦應屬蜀王生前所用之物，寶石等級與金冠紅寶石相仿佛，包鑲工藝亦不甚精。金束髮冠（彩圖二二三）：以金纓絲工藝焊接而成，用金量較少，僅三八克，但頗耗工時。形制特殊不見第二例，冠矮，兩側與後面包立牆，後牆作二山狀，銀簪導。此金冠出自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可能是明廷賞賜土司的。金嵌寶石髮簪、金帶鏈魚胸飾、金雙龍戲寶珠手鐲、金鑲寶石鳳釵、金牡丹雙龍釵及銀龍（彩圖二二四—二三〇）等金銀首飾均出自貴州遵義。據查，大多為當地土司及其夫人所用。

者，也是明中央朝廷所頒賞，其形飾、工藝均帶有明顯的明宮廷金銀器的特點。飛鳳金髮簪（彩圖二二九）：定為明代，一九七八年徵集，今從圖片來看其鳳有月形冠，勾喙，吐舌，宛若唐宋之飛鳳，在明鳳中難得一見。

肅王起自朱模，模為朱元璋庶十四子，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改封肅，就藩甘肅，後移蘭州，傳九世。朱識鉉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年）封，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年）為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推翻而滅亡。九代肅王在王位計長達二五一年之久。金嵌寶石鳳冠（彩圖二三一）：由五鳳組成，高達三九厘米，屬金鳳冠中之殊例。鑲寶石金首飾亦甚精美，可能大多也是來自宮廷賞賜。金鳳紋鏤空香囊（彩圖二三八）：鑄有『銀作局正統五年八月內造金一兩九錢』，公元一四四〇年製造，賞賜二世肅康王妃之物。金鑲寶石耳墜（彩圖二三六）：以金絲包鑲工藝打製，非內廷之物，可能是當地民間作坊所造。曾見『福壽』銘銀壓勝錢：錢形，鑄『崇禎五年捌月初十日』、『伴讀姚進施』。此銀器是姚進專為明肅藩九世王於崇禎五年（一六三二年）重修多子塔而製，之後十一年，一六四三年藩王便死於農民起義。

萬曆帝后生前所用的一部分金銀器，由於一九五八年發掘定陵我們才有機會看到，其成器年代大多在一五七三年—一六二〇年間，個別也有早於萬曆朝的。金翼善冠（彩圖二四六）：除二龍之頭和寶珠之外全用金絲編織工藝製成，這是迄今所見等級最高、年代確切、工藝精湛、體積最大、用金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一件金編織工藝品。金酒注（彩圖二四七）：器型奇特怪異，想必有其觀念上的、實用上的兩重需要才取此非同一般的異常造型。裝飾採用減地隱起紋，地子用斧鑿鑿成沙地，以襯托主紋使其更加鮮明突出。這種工藝需要厚胎，用金量增多，即使在內廷金器中也很少使用，民間金工則更不敢嘗試了。另外，在鑲嵌工藝上用玉和寶石兩種貴重材料，寶石用包鑲和扁齒加固，使其牢固不易脫落。此注造型姑且勿論，僅從其裝飾工藝來說即足以代表萬曆朝宮廷金工藝的最高水平。金帶柄罐（彩圖二四九）：從器型看應是生活用器皿，腹部雙鈎『尚冠上用』四字，『尚冠』待考，『上用』即皇帝親用之意。底亦雙鈎『大明萬曆年御用監造八成五色金重二十二兩三錢』。御用監為明宦官二十四衙門十二監中的專承造辦御前所用及諸玩器的一監。此罐殉于萬曆帝棺內，可知其與皇帝生活之密切關係。金瓶附箸、鏹（彩圖二五〇）：此貫耳長頸龍鳳戲珠紋金瓶係爐瓶三式之瓶，箸為揀夾燃香用的，鏹是翻壓香灰使用的，也是萬曆帝生前熏香所用的三式中的一器。金漱盂（彩圖二五一）：淺腹，平底，身飾二龍戲珠陰綫紋，底鑿『大明萬曆辛丑年銀作局製八成色礦金沙地雲龍漱盂一個重十兩』及官匠姓名。萬曆辛丑年為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年），係萬曆中期，『沙地』即指圖案地子經砍鑿呈麻地，吸光而不反射，可起襯托作用，明金工藝術語稱『沙地』，亦可稱『麻地』，竹木牙石雕刻亦有此法。『漱盂』即飯後漱口時盛水之器。銀匠是楊宗禮。金花絲盒玉盂（彩圖二五二）：以纍絲工藝製成玲瓏剔透之二龍戲珠紋，底外壁刻『大明隆慶庚午年銀作局造八成色金盒一個碟金重二十八兩六錢』，隆慶庚午即其四年（一五七〇年）。隆慶款器甚少，素稱珍稀，帶干支的隆慶款更少，此款也是金器上惟一一個隆慶庚午款。萬曆龍潛時其父隆慶帝將此金盒賞賜給他，死後殉於棺內。金面盆（彩圖二五四）：係孝端皇后生前日用之金面盆，口沿背面刻器名，可知此盆確為面盆，由銀作局銀匠楊夢元於萬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年）用六成金打造，平銀雲龍紋，『平銀』即陰綫刻。金粉盒（彩圖二五五）：出於孝端皇后棺內，出土時盒內殘留有白色粉末，尚有餘香，可知此金盒是孝端皇后生前用作盛香粉的器皿，故名金粉盒。此盒八方，刻飾龍紋，內置圓形金撲子，面上亦飾二龍戲珠紋，無一鳳紋，故疑其盒并非女性所用，尤其八方盒內配一圓形粉撲也不合諧，可能不

是原配，但其皇家氣魄依存，仍不失為一件較精美的皇家金工藝品。金鑲珠寶簪（彩圖二五八）：藏傳佛教覆鉢形塔，相輪頂作火焰光，中鑲東珠一粒，渾圓光潤，猶如一輪明月。下有基座，座有欄杆，座下鑲紅藍寶石三粒，塔身與相輪全以累絲工藝製作。此簪反映了藏傳佛教在內廷盛傳不衰的情況，而以藏佛塔為簪也是前所未見的造型，很有創意。金鑲珠寶香熏（彩圖二六〇）：由鈎、鏈、柿蒂蓋及鷄心形熏組成，這是迄今所見最為完整的金香熏，如何佩繫可一目了然。柿蒂飾用累絲作工，上施包鑲紅藍寶石，熏以薄片金片鑲江崖海水、雙龍戲珠紋，再用鑿打出圓孔以便香氣溢出，中心鑲東珠一粒。此龍也是萬曆時期陶瓷器、漆器上常用的細身龍。多種金工藝用於一器乃是此熏金工藝上的特點。上述萬曆帝后所用金銀器不論從形飾還是工藝都足以代表萬曆朝精湛的皇家金工藝的高超水平和豪華的皇家氣魄，同時表現出其時皇家金銀器典型的藝術風格。

萬曆朝品官的金器可從正三品右副都御史王士琦（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卒）生前所用金器瞭解其一、二。金帶鈔（彩圖二六一）：共二〇方，也是完整無缺的金雙獺尾帶鈔，除四方小方鈔飾芝紋之外，其他十六方均錘鑿隱起的獺豸紋。獺豸是神獸，善別曲直，對『不直者』、『不正者』加以觸咋，故成為御史衙門的象徵和標志，用於官員的補子和帶鈔，被當作專用的標志性圖案，其尺寸也與萬曆朝帶鈔的規格相吻合。金絲髮罩（彩圖二六二）：也是應用絲編工藝製作一個小小的金絲髮罩。真是無獨有偶，民間有金絲編的髮罩，宮廷也有更大的，工藝複雜者有用金絲編的翼善冠。這兩頂金絲編的冠罩說不定同是一地金工匠在不同場合按照不同要求編綴了不同的製品。那麼這些金工匠到底出自何地呢？想必是出自南方。聯繫另一頂金絲髮冠略大於前者，用金量倍於前者，編絲工藝精於前者，二單冠均為五梁，係三品官所戴，而此單出於杭州，這樣可否認為這三頂編絲冠罩均出自杭州呢？杭州在南宋是行在，到元代則是『杭州路金玉總管府』的駐地，可以理解杭州正是南方金玉工藝的中心，所以編出金絲網的髮罩和翼善冠是順乎情理之事。

一金樓閣人物釵（彩圖二六五）：鑿刻三學士出行圖，其人物鞍馬、小橋流水、亭臺樓閣、樹木雲靄意境幽深，構成層次繁複的立體景觀并且富有詩情畫意。背有七絕《三學士詩》，造於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出於重慶五雲村明墓，據發掘者考證，此墓應是蹇芳之墓。銀蟠桃形杯、銀八駿圖碗、銀鍍金壽字委角方盤、銀鍍金蓮荷紋桃形盤、銀雲鶴紋三足香爐（彩圖二六六—二七三）出於重慶市長壽縣火神廟街窖藏，銀八駿圖碗（彩圖二六八）外底陰刻楷書『崇禎年製』款，發掘者考訂為明代崇禎兵部尚書陳新甲之物，可能由重慶或其鄰近城鎮銀工所造。

明亡後先後有福王、魯王、唐王、桂王等諸藩登極稱帝改元，繼續抗清達二〇年之久，史稱南明。銀桃形杯、銀勾連雷紋爵、銀花卉雙螭山水人物紋盤托、銀花鳥人物紋盤（彩圖二七六—二八五）俱為湖南通道侗族自治縣江口鄉下水涌村瓜地組窖藏出土的南明銀器，均係丙戌、丁亥兩年黨翁下屬或友人為他祝壽時所送的禮物。丙戌即清順治三年、南明唐王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年），丁亥為清順治四年、南明桂王永曆元年（一六四七年），這些銀器可能是湖廣所造。『永曆五年』款『慶振後標營副總兵關防』銀印（彩圖二八六），永曆即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年）桂王稱帝於肇慶時改元之年號，永曆五年即清順治八年（一六五一年），此銀印由南明朝廷所頒發，一九九〇年出土於廣西平樂縣源頭村大岩。